

日本进步史学家

江口圭一

主 编 杨栋梁
副主编 宋志勇
米庆余



人
文
社
出
版

日本进步史学家

江

口

圭

一

主 编 杨栋梁
副主编 宋志勇
米庆余

人
民
出
版
社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进步史学家江口圭一/杨栋梁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8

ISBN 7-01-003729-9

I. 日… II. 杨… III. ①日本-近代史-研究 ②日本-侵华-
历史-研究 IV. K313.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5744 号

日本进步史学家江口圭一

RIBEN JINBU SHIXUEJIA JIANGKOUGUIYI

主编 杨栋梁 副主编 宋志勇 米庆余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 <http://01.peoplespace.net>

E-mail: 01@peoplespace.net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1
字数: 311 千字 印数: 1-700 册

ISBN 7-01-003729-9 定价: 26.00 元



江口圭一日本研究基金紀念碑揭幕式合影(1995年)



南開大學向江口圭一客座教授致聘儀式合影(1995年)



江口圭一与吴廷璆教授、俞辛焯教授夫妇(1984年)



江口圭一与俞辛焯教授
在东京(1986年)

值此江口圭一教授七十华诞之际，谨向江口先生表示深切的敬意和热诚的祝贺！

衷心祝愿江口先生健康、长寿；祝愿江口先生事业发达、更加活跃；祝愿我们的友谊、合作不断发展、地久天长！

对江口先生长期来为中日学术交流的努力和巨大贡献深表谢意！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 汤重南

恭祝

2002年3月26日

恭祝

江口圭一教授七十华诞

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万峰

2002年3月26日

卓越的学识 崇高的品格

祝贺江口圭一先生七十华诞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理事长

俞辛焞

2002年4月15日

目 录

卓越的学识 崇高的品格(代序)	杨栋梁 1
真挚的友谊,可敬的业绩——记江口圭一先生	吕万和 14
江口先生是我心中的老师和朋友	米庆余 24
贺江口先生七十寿辰	
——兼谈《十五年战争研究史论》读后感	周启乾 27
我接江口先生来南开	管 宁 40
我所认识的江口圭一先生	熊达云 47
两面性帝国主义论——记九一八事变前后	江口圭一 56
天皇制立宪主义论	江口圭一 86
七三一部队与教科书审订	江口圭一 103
满洲事变时期研究的再探讨	江口圭一 127
满洲事变与民众动员——以名古屋市为中心	江口圭一 140
关于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几个课题	江口圭一 185
通向卢沟桥事变之路——十五年战争的视角	江口圭一 209
南京大屠杀史证三例评析	江口圭一 225
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与日本人的国家意识	江口圭一 237
日本的侵略与日本人的战争观	江口圭一 261
我的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之路	江口圭一 282

江口圭一与十五年侵略战争史研究	杨栋梁 297
江口圭一与日本对华鸦片战争研究	宋志勇 318
读江口圭一新作《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	米庆余、张耀武 353
江口圭一教授论日本的侵略与日本人的战争观	杜小军 373
币原外交的另一面——评江口圭一著 《日本帝国主义史论——九一八事变前后》	松尾尊究 386
评江口圭一编著:《资料 日中战争时期的鸦片政策 ——以蒙疆政权为中心》	仓桥正直 388
评《十五年战争小史》(新版)	吉田守男 400
评《十五年战争研究史论》	安井三吉 403

卓越的学识 崇高的品格(代序)

——庆祝江口圭一先生 70 华诞

杨栋梁

30 年前,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向全世界庄严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正式恢复邦交关系。

30 年来,两国关系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坎坎,和平、友好、合作的基础毋宁说更加坚实。其理由之一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合作与信赖关系正在加深,并且这种关系是在经历了一个逐步脱掉起初相当程度的感情色彩而基于理性认识的变化过程实现的。自不待言,为了维护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除了两国政府间作了大量工作外,正是两国民间人士的真诚交往与合作,才奠定了这种关系的坚实基础。

值此纪念两国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这本书,就是要向中国读者介绍在构筑和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过程中,日本的社会科学研究战线上有这样一位学者:他学术功底深厚,理论视野高深,对战前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了独到的理论剖析;他主持正义,捍卫真理,以确凿的史实和犀利的笔锋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战前日本的侵华罪行;他尊师重道,身体力行,倾注极大热情指导和帮助过众多中国学者;他胸襟坦荡,无私无悔,毅然捐巨资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日本研究事业。他

就是当今活跃在日本学术界的著名近现代史学家、进步学者、爱知大学法学部教授江口圭一先生。

—

江口圭一先生 1932 年 8 月出生于名古屋,1951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1958 年硕士毕业后,经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泰斗井上清先生力荐,留校担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一干就是 8 年。1966 年,再经井上清先生推荐,赴爱知大学法学部任教至今。

在京大学习和工作的 15 年里,江口先生一直是“井上读书会”的成员,井上先生“不平凡的大家风度”成了他一生尊崇的目标。渡部彻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研究方法,使他受益匪浅,由此江口先生在青年时代便打下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专业研究修养。

江口先生的学术研究最初是沿着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营业税运动、排外风潮这样一条线索展开的。由于得到井上先生的赏识,1963 年起参加了《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的撰写工作,执笔内容是“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此后的研究便逐步向币原、田中外交、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扩展,其相关研究成果亦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专著《日本帝国主义史论——满洲事变前后》(青木书店 1975 年)、《城市小资产阶级运动史研究》(未来社 1976 年)、《昭和的历史 4 十五年战争的开幕》(小学馆 1982 年)、《资料 日中战争时期的鸦片政策——以蒙疆政权资料为中心》(岩波书店 1985 年)、《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 1986 年)、《日中鸦片战争》(岩波新书 1988 年)、《大系日本的历史 14 两次大战》(小学馆 1989

年)、《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青木书店 1998 年)、《十五年战争研究史论》(校仓书房 2001 年),以及大量合著和专题论文,成为日本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学者。

江口先生学术见识高远。1956 年,鹤见俊辅教授首次提出“十五年战争”的观点,一时间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批判之声骤起而和者甚寡。江口先生则旗帜鲜明地支持鹤见的观点,他撰文指出:日本自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至 1945 年 8 月 14 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及 9 月 2 日向盟国签署降书的 15 年间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不是零散、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彼此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并恶性发展的一场战争,因此应该把这三个阶段的战争统称为十五年战争。同时还指出,这场由三个阶段构成的十五年战争并非是命里注定、直线发展的,而是一个充满曲折的复杂过程。九一八事变之所以发展为日中全面战争,日中全面战争之所以又扩大为亚洲太平洋战争,完全是人为选择的结果,是日本的统治者之间通过各种对立、妥协与合作,最终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并加以推行。江口先生的论证极大地丰富了鹤见“十五年战争论”的内容,使之更具系统性和说服力,现今已为日本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江口先生理论造诣颇深,其学术研究的理论建树于下述内容可见一斑。其一是提出“从属和侵略两面性特征的日本帝国主义论”。他指出:从属性的根源在于日本经济的相对落后和基础的脆弱性,这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本、贸易和资源供给等三大方面对欧美及海外市场的严重依赖。侵略性的根源则在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他同时指出,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所以能屡屡得逞,在于其依赖美英并得到后者的有力支持,而无限的扩张又势必会影响到美英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导致矛盾的冲突与破裂。

其二是提出“对美英协调主义与亚洲门罗主义两条对外路线论”。江口认为,国力上劣于美英而强于亚洲各国的两面性的日本帝国,其统治阶层内部在对外路线的选择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又主要是围绕着是推行对美英协调主义还是亚洲门罗主义展开的。在日本的统治阶层中,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对美英协调路线始终居于主流位置,而在进入30年代后,亚洲门罗主义路线暗流涌动,并急剧地扩大着其在日本社会的市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揭开了十五年战争序幕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美英协调主义向亚洲门罗主义即武力扩张路线的转换。

其三是提出“天皇制立宪主义与侵略战争关系论”。日本学术界在关于天皇制与侵略战争关系的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程式化”、“绝对化”问题,如天皇制法西斯论认为,在对外侵略扩张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本质相同,行动基本一致。对此,江口先生的看法是,如果从本质分析的角度上述观点可以成立,但是在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时,就不能过于简单化,比如天皇制法西斯论在解释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社会的复杂现象时就存在若干难点。江口先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美英既依赖又对立的矛盾,导致对外关系上出现了对美英协调主义和亚洲门罗主义两条路线,而两条对外路线的成立又是以天皇制国家的权力结构、即政治体制的两面性为基础的。明治宪法规定的国家体制是天皇制立宪主义,这种体制既有专制主义的一面,又有近代意义上的立宪主义一面。国家权力结构的这种二重性对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直接影响,因此,历史过程充满了矛盾、斗争,唯此,历史研究也应该循着这样两个彼此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途径展开。

可以认为,江口先生的上述三大论断,抓住了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其关于战前日本存在的两条外交路线及天皇制立宪主

义的论述,对中国的日本研究者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

如果说江口先生的理论贡献充分地展示了其卓越的“史才”和“史识”,那么,他的高尚“史德”更令人肃然起敬。

德者,道德品行是也。史家有德,据实叙史,扬正贬恶,如司马迁遭阉刑而正气不舍;史家无德,可凭空捏造,黑白颠倒,此等败类古今中外亦皆有之。江口先生堪称一位学识渊博、正气浩然的知名学者。他坚持真理,尊重事实,不仅以确凿的史实无情揭露战前日本的侵略行径,而且不惧右翼恫吓,长期以来矢志不渝,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与否定侵略历史的各种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日本的历史学界,围绕卢沟桥事件的起因和“谁应承担罪责”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江口先生根据当时日本政府的有关文件、当事者回忆录及《第一联队战斗详报》等有关文献,对这一事件的过程作了深入的考证和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指出:事变前驻华日军第一联队就“制定了偷袭中国军队军官宿舍、营房、城门等计划,并命所有军官数次进行实地勘察”,偷袭中国军队的准备正在着着落实,进而严厉驳斥了某一日本学者关于“卢沟桥事变前日军没有与中国军队作战意图”的论调。关于事变爆发的责任,江口先生的考证结果是:日本方面的所谓士兵失踪或中国军队开枪引起冲突的理由均不能成立,而是骄横自大的现地日军指挥官为了维护“皇军的面子”和固有的蔑视中国军队的心理挑起的。江口先生不同意许多中国学者坚持的日本“计划说”,也反对个别日本学者提出的中共“阴谋说”,而是认为“与柳条湖事件不同,卢沟

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但他同时指出：“虽说是偶然发生的事件,那些所谓不得已、无责任、非侵略之类的论调也是不成立的”。卢沟桥事件,“显然是日军有意识地挑起的,其主要责任者明明白白就是一木大队长和牟田口联队长”。“卢沟桥事件”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尽管有人极为讨厌使用侵略一词,还是应该坦率地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正确的历史认识来自实证性和客观性,以及无所忌惮地直面真实。如果能搞清楚本国历史的过错、失误和污点,那么无论有多么讨厌也是应该承认的,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认识。”

日军在侵华期间,为了彻底摧垮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迅速灭亡中国,曾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采取了“三光政策”、化学战、细菌战和人体试验等种种非人道的手段,江口先生和日本的进步学者一起,对这些灭绝人性的行径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和揭露,并予以猛烈地批判。除此之外,江口先生还首次揭露了日本侵华期间推行鸦片政策以灭亡中国的事实。1982年,他在一份旧书处理目录上发现有伪蒙疆政权的资料,史家特有的敏感驱使他亲赴东京查看并重金买下,结果发现在这份由伪蒙疆政权经济次长沼野不二(1981年死亡)保存的档案中,含有大量日本侵华期间有计划地在华种植、制造和销售鸦片的原档资料。据此,江口先生整理成书并公布于众,指出这是继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由日本发动的又一次鸦片战争,是与武力相并行旨在灭亡中国的又一种完全违背国际公约的罪恶手段。这些成果不仅深入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罪行,而且填补了中日学术界研究的空白,引起有关各国的震动,中日主要媒体都竞相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予以高度评价。

就日本的史学界而言,对那场侵略战争所带来的“受害与加

害”的认识,可谓是检验一个学者有无良知、良心的试金石。江口先生批评说,许多著述对此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有些人对冲绳战役中日本民众的悲惨遭遇大书特书,而对日中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却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在这一问题上,江口先生本人旗帜鲜明,他在其著述中反复强调,日本人必须直面看待和深刻反省那场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的“侵略与加害的责任问题”,而要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是昭和天皇;其次,民众也应该思考自己的责任。

江口先生指出:“日本在十五年侵略战争中,给被侵略国造成巨大损害,而且不仅是人的伤害”,追究这些战争指导者和实行者的责任和罪行理所当然。然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很不彻底,“特别是对那个对十五年战争负有最大责任的人物根本置之未问”。“十五年战争期间,——战争指导者更换频繁,只有昭和天皇裕仁自始至终保持其地位,作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帝国陆海军。因此,天皇必须对他所行使统帅权负责”。“昭和天皇在满洲事变时,默认了林朝鲜军司令官的严重违反军纪行为,颁发了全面褒奖关东军擅自行动的敕语;日中战争时,在御前会议上批准了过苛的媾和条件,屏退希望与国民政府继续谈判的参谋本部,使近卫内阁‘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走上了战争长期化的道路;亚洲太平洋战争时,四次通过御前会议做出‘圣断’,以大元帅身份直接指导战争,使建议尽快结束战争的近卫奏章束之高阁,招来惨祸,进而又因维护国体的顾忌迟迟不肯接受波茨坦宣言,使祸患愈演愈烈。这些正是昭和天皇当负战争责任的主要根据”。明治宪法虽然规定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但是在天皇制立宪主义体制下,“天皇必须遵守大日本宪法”。“然而天皇却通过宪法上毫无根据的御前会议即非立宪程序一再决定重大的最高方针。既然不按宪

法办事,当然也不能受宪法保护。宪法毕竟是国内法,对外天皇是不能逃避责任的。——按照国际法的法理,对于采纳大臣建议而犯罪者,即使是立宪君主也不容宽赦”。

那么,日本国民对十五年侵略战争有无责任?江口先生的看法是肯定的。他指出:“一般说来,劳动大众是最为反对现行体制的存在,但那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反体制的力量在某种条件下转向被压迫的异族民众也是帝国主义压迫民族的民众所具有的一般倾向”。事实上“受危机伤害最深的无产大众的愤懑没有指向反对现行体制,而是倾吐给了外敌”。“以往的民众史研究缺陷在于,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着力点倾注在验证和彰显劳动民众的先进部分的先进行动上,而对劳动民众必然带有的否定性侧面却闭眼不见,因而不能把握民众的整体形象”。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战时的民众动员体系无论多么庞大和完整,“如果民众自身没有积极性和自觉性,那么动员就只会流于形式无果而终”。“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最大课题之一,就是冷却了对这种侵略者和加害者的日本民众、特别是劳动大众的真相把握”。研究者们不愿触及民众的战争责任问题,“也许是有那样做会减轻统治层的战争责任而变成‘一亿总忏悔’的担心,但是反过来的结果只能是对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成员的日本民众的行为和责任置之不问”。他进一步分析说,日本民众之所以支持了十五年侵略战争,原因是“他们也深受国家利己主义诱惑之害”,“在于长期教育形成的把天皇和日本国家绝对化的观念,进而产生顽固的军国主义、排外主义思想;在于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只能获得错误的、片面的信息;在于存在那种不许批判和反对天皇、国家、军队乃至战争的严厉的镇压机构。然而,既然战争是在国民的支持和协助下得以进行和维持的,既然那场战争已给其他民族和人民造成莫大灾难,既然国民未能亲自结